



宋人笔记中的宋刻珍本—— 《甲申杂记》和《闻见近录》

丁瑜

赵宋一代，有关历史琐闻一类的笔记杂著有大量作品传世。明人辑《五朝小说》在“序言”中论及宋人笔记时谓：“唯宋则出土大夫手，非公余纂录，即林下闲谭。所述皆生平父兄师友相与谈说，或履历见闻，疑误考证；故一语一笑，想见先辈风流。其事可补正史之亡，裨掌故之阙。”由于宋人所作笔记多系亲身经历，或“父兄师友相与谈说”的事情，所以其内容具有重要史料价值，可补正史之不足。近年中华书局校点排印了多种宋人笔记，如苏辙的《龙川略志·别志》、魏泰的《东轩笔录》、何籀的《春渚纪闻》、蔡絛的《铁围山丛谈》、陆游的《老学庵笔记》等，以《丛刊》的形式出版发行，为历史考证和史学研究提供了非常可贵的资料。与此同时，还以介绍宋元旧刻精品为目的，陆续影印现存宋元珍本，辑为《古逸丛书三编》出版发行。其选目中有北京图书馆藏宋本《甲申杂记》和《闻见近录》两种宋人笔记亦将影印。此宋本极为罕见，其内容与明、清间刊印的通行本亦多有不同，故介绍如后：

作者与作品

《甲申杂记》、《闻见近录》均宋王巩撰。巩字定国，自号青虚先生，大名莘县人（今属山东省）。父王素字仲仪，宋仁宗初年官屯田员外郎。祖父王旦字子明，真宗时名相，封魏国公，谥文正。曾祖王祐官兵部侍郎。王巩出身累代显宦、世代书香之家。他本人又天赋聪雋，长于诗文。早年随苏轼游，至京都，为参知政事冯京所赏识，荐举于朝。因受王安石等变法派的阻挠，被派往扬州任副职。

神宗熙宁间苏轼知徐州，王巩前去访问，苏轼与之同游泗水，登鼈山，吹笛赋诗，赏月饮酒。并在泗水之滨的黄楼设宴款待他，与会者三十余人。苏轼说这次游赏聚会自“李太白死，世无此乐三百年矣。”苏赠王巩诗谓：“相逢不用忙归去，明日黄花蝶亦愁。”正因为王巩和苏轼的交谊非常深厚，故苏轼于神宗元丰初年谪贬黄州（今属湖北省），王巩受到牵连亦贬窜宾州（今属广西省）。在宾州贬所经三年之久，才被改谪监筠州盐税（今江西省高平县）。王巩在筠州将谪贬期间所写的诗集寄给苏轼，苏轼颇受感动，给他的集子写了一篇序言，对王巩受己之牵连被贬，深表歉意。序言之外，还复一信，赞王巩之诗“篇篇皆奇，老拙此回真不及”。又有赠诗曰：“鬓霜饶我三千丈，诗律输君一百筹。”通过这些诗文信札，可以看到当时的一代文豪苏轼对王巩的才华文笔十分赞赏。

元祐初年，王巩被赦免召回京都，官宗正丞。宗正官职品级不高，但系掌管朝廷宗人亲属的工作，能多知朝廷大事。王巩在任期间，曾多次遇到拜官授职的机会，总因为他跌宕傲世、不拘小节，受到谏官的反对而不能赴任。

哲宗亲政后，绍圣初年，他又被谪为荣州签判（今四川省）。

不久召回，一生都未能显达。王巩的事迹，史书缺乏系统详尽的记载，《宋史·王素列传》附有他的传记，不足百字，极为简略。宋人笔记中却不少与他有关的琐闻轶事；苏轼集中更多论及他的诗文。可见王巩在北宋一代是有一定影响的人物。

王巩家学渊源，知识广博，通经学、擅长诗文。著有诗集和《论语传注》，可惜在靖康之变中亡佚。传于后世的著作有笔记三种：

《甲申杂记》一卷。“甲申”即宋徽宗崇宁三年（公元1104）。内容所记凡四十条，上起宋仁宗下诏徽宗大观元年（公元1107）。无论朝廷大事，乡野琐闻，不分事件发生先后，均随手札记。

《闻见近录》凡八十六条。所记上起周世宗下诏宋哲宗元祐、绍圣间，而以宋真宗、仁宗两朝事为多。

《随手杂录》凡三十三条，其中记五代十国事三条，余均记宋朝事。

王氏所著二书内容所记多是亲历、亲见、亲闻之事。凡有关当代之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医术、宗教、习俗均有涉及。如“汴河旧底有石板石人”条，详记真宗、仁宗两朝疏浚汴河的方法和执行制度；“柴世宗销天下铜像铸钱”一条，反映出五代时期，国贫民困的情况；“熙宁八年，饿莩无数，作万人坑”条。记录遭逢灾荒的岁月，广大农民饿死，少数富豪施赈祭亡魂，以抚慰人心的事，反映了变法的失败。又《甲申杂记》有一条谓：

老人多言，历日载几龙治水，惟（龙）少为雨多，以其龙数多即少雨也。又旧言雨暘有常数，春多（暘）即夏旱，夏旱即秋霏。皆大不然。崇宁四年岁次己酉，凡十一龙治水，自春及秋皆大雨水。

千百年来即有几龙治水的民间传说，作为气象预测的根据。迨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出售的日历上，还刊有几龙治水的记载。王巩在八百年前已指出它不可信，实在难能可贵。更重要的还在于他提供了崇宁四年（公元1105）“自春及秋皆大雨水。”是非常有用的

气象历史资料。

至若有关北宋历朝帝后之间的揽权争宠，皇储废立，朝臣的升降，边将的调遣。变法后，新党、旧党派系间的斗争。王安石、苏轼等人的轶事。在此书中都有反映。王巩以当代人记当代事，其所记的史实则更具有真实性的价值了。

流传与版本

王巩所著笔记三种，在他生前并未刊印，也没有抄录副本，只存有自己手写的稿本。到他晚年还将全部稿件赠给了友人之子张由仪。靖康间，会稽令翟巽赴任过维场，见到张由仪收藏的稿本，又尽数携去。

绍兴元年（公元1131），淮海张邦基在吴郡找到《甲申杂记》和《闻见近录》二书的抄本。又二年复得《随手杂录》，张邦基合三书抄为一帙。至宋孝宗隆兴元年（公元1163），王巩的从曾孙王从谨借到向氏藏本，又重抄一部副本，藏于自己的家中，从此王氏家中始藏有先人的著作。乾道四年（公元1168）夏六月，王从谨借同舍吴一能藏本校家藏的《甲申》和《闻见》二录，发现自抄本较吴本尚阙二十六条及辑《补阙》一卷附于后。可以考见在南宋初期，此书已有向氏藏本和吴氏藏本两个不同的抄本，经王巩的从曾孙校对整理，成为一个比较完全的本子。

稿本与抄本的渊源关系有如上述，现在能见到最早的本子不是抄本却是刻本。此刻本即北京图书馆收藏的宋刻《甲申杂录》和《闻见近录》二书。二书均每半叶十行，行十九字，白口，左右双边。版心上镌字数，中镌《杂记》、《闻见录》。版心下镌况天祐、余致远、致、志等刻工的姓名。书中避宋讳字，遇构字则注“御名”，慎字则缺末笔。版刻字体近似颜柳之间，刻工况天祐于绍熙、庆元间在吉州曾刻《文苑英华》。根据刻工、字体、和

宋讳等特征，可定是书为南宋中期江西刻本，大致不差。

此宋本仅有《甲申杂记》、《闻见近录》各一卷，不见《随手杂录》及《补阙》二十六条。与《宋史·艺文志》著录相同。可推断是书在南宋刊印雕版时，即刻两种两卷。

《甲申杂录》卷首钤有“文渊阁”篆文方印，可证是书在明代为秘阁所藏。又有“巴陵方氏收得古刻善本”等朱印，是清末湖南方功惠柳桥的藏书印记。光绪间方氏病故，藏书出售，此宋本为诗人樊增祥所得。

增祥号樊山，累官陕西、江宁布政使，后居北京，是当时著名诗人。光绪二十五年（公元1899）春，樊氏将是书赠给国子祭酒盛昱。盛氏于当年冬病逝。藏书散出，此宋本旧藏园居士傅增湘所得。傅氏精于校勘、版本之学，家富藏书。一九二四年，樊增祥于傅家重见此宋本，倍增感慨，曾撰跋文于卷末：

余己亥春入都，伯熙过我曰：“君勿以手帕金见贻，得书画一、二种足矣。”适行篋有此书，即出示曰：“此宋本佳否？”伯熙曰：“大佳。”怀之而去。迄今二十六年，复见于沅叔案头，既悼意园之失弓，复贺藏园之得宝也。

甲子三月二十一日七十九翁樊增祥跋

此后，这两种罕见宋本，几经辗转，在建国初期，终究为国家图书馆所收藏。

此书除宋刻单行本外，不见其他单刻。惟见丛书本。以顺治间宛委山堂刻《说郛》本、乾隆嘉庆间鲍廷博刻《知不足斋丛书》本，以及道光间晁氏木活字印《学海类编》本最为常见。这三种刻本均较宋本多《随手杂录》和《补阙》。据鲍廷博在《知不足斋丛书》本跋文中说：“戊戌之秋（乾隆四十三年），余传朱竹垞老人手抄《随手录》及《补阙》一卷甫竟，复得宋刻《闻见》、《甲申》二录于吴兴书贾。窃喜其合并之奇，又惧其久之而复佚也，为汇而刊之。”据此亦可知原宋刻本确为二种二卷。而《随

手杂录》及《补阙》则向以抄本流传也。

鲍氏汇刻《甲申》、《闻见》、《随手》三书时，题总名为《清虚杂著》三种三卷附《补阙》一卷，收入《知不足斋丛书》第五集中。《学海类编》汇刻时题总名为《王氏三录》三卷，而将《补阙》分别刻入《闻见录》中二十五条，《甲申记》中一条；其题名与宋本和《知不足斋》本亦有不同，将《甲申杂记》改题为《甲申杂录》，故其总名题为《王氏三录》，其内容亦多歧字，如“张大夫士澄房兄士宁居咸平”条中有“冀五郎”。《类编》本作“冀邱郎”；又如“前人每子弟及冠，必置盛饌”条中有“其由是矣”。而《类编》本则缺。又如“上心忧惧”《类编》本作“上益忧惧”，其分歧不同之处仅《闻见近录》一卷之中即有百余字。可见刻《知不足斋》所据之底本与刻《类编》所据之底本原不相同，乃是两个系统。两书优劣显而易见，鲍氏所刻最近于宋本。因其中《甲申》、《闻见》二录乃据宋本重雕。《类编》本舛误较多，因系据抄本上版雕印的缘故。

1984.7.26

